



逃犯条例 深度

评论

不羁放纵爱自由：“反送中”运动背后的港中政治分歧

香港市民对自己城市实质自主和自由的诉求，正好跟一个正在兴起的威权中国发生冲撞。中国可以与外界平起平坐、直接协商，而香港的特殊管道和制度也因此逐渐失去了意义。

周思城 | 2019-07-01



2019年6月16日，民间人权阵线再次要求当局撤回逃犯条例的大游行，其表示有“200万+1”人参与示威，创下香港游行人数最多纪录。摄：林振东/端传媒

香港近日发生了一系列反《逃犯条例》修订（“反送中”）的大型抗议行动，当中包括616的两百万人大游行，堪称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甚至超越2014年的“雨伞运动”和1989年声援“六四”的大游行。有些观察者难以理解香港人的行动，认为港人这样做很蠢很天真，甚至很幼稚，正在自我撕裂且以卵击石。从物质利益考量的视角出发，香港市民挑战国家机器和暴力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不但没有好处，还要冒著人身安危和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这样做也似乎无法解决如物价、房价、工资、贫富差距拉大、安老和教育等基本民生问题。

相异于以上看法的背后原因理解，恰恰是许多香港市民对掌权者有疑虑和不信任，以及坚持自主、要求约束行政权力、争取加入决策和立法程序。持有这种价值观的人注重的是民众参与，以及透明和公开审议可带来的程序正义，认为有了这些前提，民生和其他议题才会有足够的保障来彻底解决。同时，许多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轻人，都把现在面对的各种民生问题，归咎于权贵小圈子的长期幕后操作、黑箱作业和官商勾结。

这种政治价值和偏好的出现，似乎是在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后，才明显形成和成熟的，与香港传统权贵、公务员系统和中共等专制体制所熟习的政治模式恰好相反。

香港市民对自己城市实质自主和自由的诉求，正好跟一个正在兴起的威权中国发生冲撞。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从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六四”前后几年以外，一直经历快速的经济增长，使国力和信心大增。近几十年来的经验令中国领导层认为，稳定、富裕和壮大需要的是中共从上至下的带领和严格的管制，而不是他们眼中的过度开放和权力约束。北京当权者所理解的所谓“中国模式”发展，也愈来愈不需要依靠外界，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前例和认可。中国可以与外界平起平坐、直接协商，而香港的特殊管道和制度也因此逐渐失去了意义。



2019年6月14日，中环遮打花园举行“香港妈妈反送中集气大会”。摄：林振东/端传媒

香港的觉醒

香港政治意识的发展，也代表了政治价值或许超越了当时《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主权转移下，各方对“一国两制”的想像。

自2003年“反23条”，到2007、08年的“保卫皇后码头”、“反高铁”，以及2012年的“反国教科”和2014年的“雨伞运动”，香港发生了大大小小不同的社会运动，虽然在细节上有著明显的区别，背后的理念却相当一致。参与者所关心的，都在要求公平、公开参与政治，他们对威权和权力有著极度的怀疑，反对掌权者预先做好决定，之后硬塞给民众。抗争者认为，不透明而一直拉高房价的开发案背后，是香港政府、建筑商和财团之间的暗中利益输送，一般市民对生计、环境保护、历史文物保育等议题上的需求被无视；在教育 and 政治改革上，香港政府也一样不尊重市民要求参与的意愿，强迫市民接受他们已经表示不同意和不满意的方案和政策。

对公平、公开参与的坚持，甚至延伸到“反送中”运动中，参与者始终拒绝有“大台”领导，经过Telegram等私讯程序进行组织工作、讨论、甚至投票决定行动的进退和模式。这种政治视野和诉求，显然与殖民时期，香港市民只关心赚钱，不过问政治的形象大有不同。香港民主意识的产生和壮大，不少来自主权移交前后的经验，让许多人发现到，无论是在伦敦或北京，掌权者优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和考量，而不是在地社会和民众的需要。就连曾经欢迎过主权移交的香港市民也意识到，政治势力即使从英国转交到中国，殖民统治下的各种民生问题，在中国主权下不但没有减缓，反而不断恶化。对他们而言，最佳的解套，就是提升实质政治参与，真正实现港人治港。

香港政治意识的发展，也代表了政治价值或许超越了当时《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主权转移下，各方对“一国两制”的想像。北京和伦敦的执政者，当年在没有香港市民充分参与的情况下，彼此达成协议，决定让香港在1997年主权移交后，制度维持“五十年不变”。在名义上，双方的协定透过《基本法》落实，保证了港人的言论、集会、媒体和宗教自由，以及有限的司法和立法独立。中英双方的承诺至少在文字上，没有明确处理香港社会的可能

改变，和缔约某方反悔的诚信问题。当年有许多香港市民虽然对此感到非常焦虑，不过并没有举行大型抗议，反而决定移民或者争取外国居留权。

而1997年以来，香港经历过好几轮造成社会强烈反弹的政治风波。市民从中发现“一国两制”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若希望保住自己所关心的事情，或者寻求改进，就必须自己争取。无论是民生、保育、环保、劳工或教育议题，特别是牵涉到财团利益时，都不能依靠香港政府主动改革，必须靠市民经过公民社会向官方施压，才会有改变的一丝可能。

同时，从遵守港中两地的政治、执法区分，到落实直选政务官员的改革，中国和香港政府不时都会对之前立下的保障和承诺反悔：自1998年，张子强因为在香港办案，而在中国境内被捕、提控、处决，到近期高铁“一地两检”，中国在香港部署官员执法，以及中国人大“八三一决定”，否决香港民众直接或经由政党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等……类似情况，使香港市民深深体会到“自己香港自己救”的重要。



2019年6月21日，立法会升旗时间，示威者正集结。摄：林振东/端传媒

中国崛起的冲击

信心十足的中国在短时间内，变得比以往更能够，甚至愿意承受与大国（包括美国在内）发生直接摩擦和对立。北京或许认为香港自英法联军之役和东南互保到冷战期间，在各种势力和大国博弈下所提供的调解空间，已不再具备昔日的效应和必要。

当然，从1997年以来，改变的不只有香港。中国和世界也一直在变。今日的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论军事、世界政治影响，都远超过1980年代初与英国谈判香港未来的中国，以及1997年接收香港的中国。更高的地位让北京领导层有更大信心不向外界妥协，甚至主动去改变世界。香港之前所拥有的特别待遇，对中国高层和香港政治经济精英而言，或许变得不如以往重要。“一国两制”一开始虽然就是行政主导的制度，不过仍然通过民选立法会议员、立法程序和司法经过释法，允许对行政权力的稍微约束，不过近年来经由褫夺议席（英文disqualify俗称DQ）和人大释法，削弱已经有限的监督政府权力。除民主派，香港政治经济精英不是公开赞同，就是默不作声。

北京当局对香港的轻视，或许是因为不再依赖香港在中外之间提供特殊连系管道。香港自开埠以来，发展和繁荣都建立在中外之间的物资、技术和思想交流。尤其是在中国内部面对动荡的时候，香港提供了一个稳定和开放的自主空间，让来自不同地方的各种势力和利益进行各式交易，充分发挥位于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交叉的地理优势。无论是晚清、民国还是共产党统治初期，面对中国内部动荡或者二战和冷战的大国角逐，香港多半都能够在缝隙间，找到与各方沟通的方式。然而，今天更加强大的中国认为，自己已可以直接跟外界联系，不再需要经过香港。

信心十足的中国在短时间内，变得比以往更能够，甚至愿意承受与大国（包括美国在内）发生直接摩擦和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或许认为香港自英法联军之役和东南互保到冷战期间，在各种势力和大国博弈下所提供的调解空间，已不再具备昔日的效应和必要。中国官方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态度，显得更是如此。即使美中贸易战开打，北京也能够不顾或未有考虑到香港的潜在协调和沟通作用，反而容忍或间接鼓励香港政府冒著特

殊关税、投资、签证等待遇被美国和欧盟等政府取消的风险，在不明确的情况下推动极具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



2019年6月12日，示威者在警方以催泪弹清场后互相拥抱。摄：陈焯輝/端传媒

港中冲突难以避免

香港市民和中国政府的政治意识和走向，几乎是反方向发展的，而且彼此之间的距离愈拉愈大，能找到共识的地方恐怕不易。香港政府夹在市民争取的意愿和中国政府的要求中间，进退两难，很难折衷找到能安抚各方的平衡点。

“一国两制”其实再也不足以处理香港和北京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过港中双方到此为止，不但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北京当局也不肯往这个方向思考。对许多香港市民而言，对于“一国两制”的态度是从期望走到失望，甚至绝望。他们期待的“一国两制”，是一个在面对中国强权和国家机器时，能给予足够的个人和社会权益保障的架构。中国官方对“一国两制”的认识和解读，是一个可以套住香港社会的框架，克制香港政治影响中国内部秩序，以及防止台湾走向更独立的方向。由于北京领导层把维持“一国两制”视为巩固政权的关键手法，他们在这方面不可能作出让步。

香港政府夹在市民争取的意愿和中国政府的要求中间，进退两难，很难折衷找到能安抚各方的平衡点。况且，行政长官基本上是由北京当局操控的选举委员会产生，而立法会因为功能组别的缘故，让建制派享有永久的多数，整个香港政府体制一般不会有动力为了市民向北京坚持立场，反而更会有讨好北京的压力。香港政府的偏向，在市民眼中代表了“一国两制”的落空，只会让更多人对香港失去信心，认为港府不是在帮北京背书，就是在拥护权贵财团。《逃犯条例》修订的发起，以及香港市民的反应，就充分显示了这样的发展，也因此才会促使大量市民走上街头抗议。

从港中发展趋势观察，会发现双方的冲突难以避免。香港市民对透明、开放、参与和权力的约束越来越看重，认为是维护权益、自由、自主和保障民生的根本。中国政府则对控制、集权和各种权势的无限使用愈来愈重视，觉得一定要保存稳住政权、让中国继续壮大的基本条件。香港市民和中国政府的政治意识和走向，几乎是反方向发展的，而且彼此之间的距离愈拉愈大，能找到共识的地方恐怕不易。除非港中关系有根本和具体的改革，否

则无论是因为近期的《逃犯条例》修订，还是2014年引发“雨伞运动”的普选问题，还是其他议题，港中对抗难免会重复出现和加剧。

(周思城, 自由撰稿人)

评论

周思城

逃犯条例



热门头条

1. 中国「古装剧禁令」风波：为什么一幅微信截图，业界就全都相信了
2. 回应赵皓阳：知识错漏为你补上，品性问题还需你自己努力
3. 连登仔大爆发：“9up”中议政，他们“讲得出做得到”
4. 香港回归22周年，七一升旗礼、大游行、占领立法会全纪录
5. 梁一梦：反《逃犯》修例，港府算漏了的三件事
6. 记者手记：我搭上了罢工当晚的长荣班机
7. 马岳：“反送中”风暴一目中无人，制度失信，残局难挽
8. “突如其来”的新一代：后雨伞大学生如何看社运
9. 专访前大律师公会主席陈景生：香港现在这处境，我最担心十几廿岁的年轻人
10. 读者来函：承认我们的无知，让出一条道路给年轻人吧

编辑推荐

1. 运动中的“救火”牧师：他们挡警察、唱圣诗、支援年轻人
2. 金山上的来客（下）
3. 从争取“劳工董事”到反制“秋后算帐”，长荣罢工之路为何荆棘？
4. 吉汉：暴力抗争先天有道德包袱吗？
5. 金山上的来客（上）
6. 归化球员能“拯救”中国男足吗？
7. 进击的年轻人：七一这天，他们为何冲击立法会？
8. 荣剑：中美不再是中美，中美依然是中美，中美关系下一步

9. 贸易战手记：华府的关税听证会上，我围观了一场中国制造“表彰”会

10. 徐子轩：由盛转衰——G20大阪峰会后，全球政经的新局面

延伸阅读

四个学者告诉你，G20前后，香港的抉择与未来

请愿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G20？如何看待重新被提出的诉求“真普选”？在国际政治中，香港目前的地位、角色是怎么样的？香港学者、海外学者又如何研判影响香港前途的杠杆因素？

连登仔大爆发：“9up”中议政，他们“讲得出做得到”

“除非我老人痴呆，如果有任何的不公或问题，我一定会站出来在现实世界发声。”他们的行动，和网名同出一彻：“在沉默中爆发”，“在9up中议政”。

马岳：“反送中”风暴一月中无人，制度失信，残局难挽

特区政府自制完美风暴，不少死因有迹可寻，而集中一次大爆发，造成的破坏难以收复。特区管治已成难以挽救的残局。

钟耀华：在香港，雨一直下

我们先是一个人，而如果这是一个人。

What's New：撑警集会主办方称16.5万人出席 有与会者与示威者对骂吐口水